

■新作聚焦

达真长篇小说《家园》：

建构命运与情感的共同体

□石一宁

达真的长篇小说《家园》是一部题材重大、内容厚重的作品。《家园》首发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4年第2期，单行本由天地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2023年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项目。《家园》的发表和出版，是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是故乡，也是家园

《家园》具有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的阔博富赡，其内涵有多种显性和潜在的意义，为读者的理解敞开了多个面向。依照我个人的解读，《家园》的主题如同作品的题目所揭示的那样，即家园的建构。家园的意义是两个层面的，既指作品中的人物生长的家乡——康巴的桑戈草原和上海，也寓指中华民族大家园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小说塑造的达真的儿子曲扎、曲扎家差巴的女儿斯郎措、牧民的女儿达瓦志玛、上海资本家的儿子王本昌、王本昌和达瓦志玛的儿子琪加达瓦等人物形象，以各自的命运遭际、悲欢离合演绎和呈现了作品的复杂意蕴。

小说首先以曲扎和斯郎措的爱情故事切入。上世纪50年代，桑戈草原桑布头人17岁的儿子曲扎对差巴志玛刚满15岁的女儿斯郎措一见钟情，而桑布头人因卷入了藏区大规模武装叛乱而率家人逃亡国外，匆匆上路的曲扎又邂逅斯郎措表白：“银狐神山作证，我说完这话，你就是我的女人了。等我回来……”然而，两人都不曾料到，这一别就是40年，当年的少男少女垂暮之年才获悉彼此状况。斯郎措“被等待抽干了一切”，但心中仍有“一个遥远却从未消失的梦”，而曲扎却已和金沙岩碧眼的外国女人结婚生子，内心徒存愧疚与不安。这一出令人唏嘘的爱情悲剧，不同于传统的痴情女子负心郎模式，其中固然有忍怒与脆弱、守诺与背弃等人性的根由，但更是时代决定了两人的命运。两人的爱情还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民族历史和社会意义。诚然，斯郎措是真心爱着曲扎的，但使她在漫漫40年的煎熬中等待的还有这样的认知：“在这片马儿三天三夜都跑不出边界的草原上，头人家的话就是围栏，再刚烈的野马也逃不出；就是石板上刻的字，任水冲火烧都无法更改。既然少爷说了，自己这辈子就是‘少爷的女人’了。”因此，斯郎措的爱情悲剧，其中还有藏族社会传统的森严等级作祟。作品通过曲扎和斯郎措的爱情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族地区彻底推翻封建农奴制的民主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

有个人命运，也有家国情怀

小说中的王本昌和达瓦志玛的爱情和婚姻，则包含着民族交融和共建家园的意义。就中国的民族关系而言，汉族和藏族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民族关系。小说里王本昌和达瓦志玛组成家庭生下二子二女，他们一家又和斯郎措结成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人物设置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和隐喻性：上海和藏东；汉、藏一家；“文革”期间，王本昌在桑戈草原得到的庇护，他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研究；达瓦志玛爱上落难的王本昌，“文革”结束后跟随王本昌回上海，从最初的不适应到5年后成为所在社区的居委会主任……这些重要的细节描写，从故事表象看是个人命运的、偶然的人生起伏，但从故事的意义考察，则是民族情感共同体的萌生和结成的隐喻，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短评

直面“生活的真”，把善意留在内心

——评阎真长篇小说《如何是好》

□傅建安

20世纪末以来，随着现代性危机所引发的后现代文化寻根运动，文学被重新定义，文学的功能也被重新思考。文学除原有的认识、教育、审美功能得到探索与研究之外，文学的疗愈功能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阎真作为学者型的作家，他的创作直击“生活的真”，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他的《如何是好》以主人公许晶晶从大学即将毕业到走上社会的真实生活作为书写对象，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在左冲右突、步入社会过程中的阵痛与挣扎、抗争与妥协、坚持与和解，对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现实困境与精神出路进行了深入思考，体现出对青年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充分展现文学的疗愈功能。

小说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刻画出身于南方小镇贫寒家庭的青年女性许晶晶临近大学毕业时在保研、就业等各种现实问题方面的挫折与痛苦，表现现代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竞争中的挣扎、生存的不易。首先是物质生活的苦楚。许晶晶在培训机构入职以后，住在三家人合租的屋子里，为了省钱，她经常晚上十点回来做饭，并带出第二天的午餐，以便拿到学校用微波炉加热。在她和叶能恋爱时，怀着孕住在半明半暗的杂物间，经济的拮据使他们觉得吃快餐、盒饭都是奢侈。其次是就业之途异常艰辛。许晶晶投递了好几份简历，却只收到一个开在居民楼，“周末加班是常态，推迟下班也是常态”的公司的面试通知。当她拒绝了这家公司之后想回头时，却连这样的岗位都没有了。经历种种挫折，她最后进入了一个叫“优博”的培训机构。培训机构倒闭之后，她考公再次失败，最终去了一家房地产公司。作者不仅写主



《家园》中人物的身世

故事伴随着现当代中华民族的跌宕命运而展开，个体的悲喜沉浮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形成内在的同构关系。作品以跨越民族的“和合共生”展现了丰盈、多元的文化融合，折射出政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的建构过程

藏文化在异国他乡的奇特魅力，但最令人遗憾的也是，这些数千岁的画布、经文和各种佛雕，百年前被白皮肤、高鼻子、蓝眼睛的人拿走了，“被他们聪明地消费了”。他们在家园的丧失感中想念家园。小说的这些描写表现了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憧憬和理想。

沉郁与抒情是《家园》的叙事格调，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在沉重中涂抹丝丝暖意。曲扎在国外的流亡生涯中遇到了金发碧眼的知音，但内心始终都有斯郎措，会习惯性地忆起与斯郎措的爱情，这束爱情之光照着他心里那片幽暗的青草地，单相思一直跟随他从印度辗转转到英国、瑞士而从未熄灭。“受害”更甚的斯郎措虽陷入爱情的苦苦等待之中，但作为桑戈草原上的赤脚医生，她并不孤独，而是从治病救人，也从与王本昌、达瓦志玛一家的情谊中，从对养子琪加达瓦的爱与付出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得到了人生的愉悦和安慰。“江河哪里去？江河大海去；青草哪里去？青草天边去；爱情哪里去？爱情心里去……”这首桑戈草原流传的恋歌如同交响乐中的主题曲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小说人物的爱情令人泪目而又极其凄美。

在写作手法上，《家园》在叙事上逆时序和顺时序交替运用、穿插自然，得心应手、娴熟老到，显示了一种游刃有余、雍容大气的风格，在形式上也标示着作者小说创作的新高度。

（作者系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

■评论

艾玛的长篇小说《观相山》篇幅不长，小说常规中所要求的冲突矛盾不激烈，不过是中年夫妇邵瑾与范松涛日常生活中截取的一段时光。一个经过二度组合的家庭，可以说是儿女双全，而且孩子们都已经长大，女儿得慧在学习金银首饰设计，儿子得安在部队当通信兵，各自都有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不用父母亲多操心。邵瑾在一家社科院所属的杂志社做副主编，工作兢兢业业，生活波澜不惊。范松涛除了学校的教学工作，还做一些校外辅导，赚一些外快，贴补家用，为自己和女儿得慧的两套住房还贷。小日子过得安安稳稳，住在青岛地标观相山（即现实中的观象山）山后，工作之余，悠闲地喝一杯青岛鲜啤，在山前观海，山后散步，过着小有近忧鲜有远虑的自在生活。他们的朋友圈和亲友团也非常有限，邵瑾唯一的好朋友是她的学姐程凌云，一位可以称得上是事业有成的中年律师。范松涛在同代人中唯一挂牵的是罹患精神疾病的小观，也就是已经亡故的中学同学大观的弟弟。

读到这里，我忽然有所领悟，从作品的气象到人物的命名都是向内的，小日子、小格局。洋洋大观，气象万千，可是大观已故，只有小观还在精神困顿中委曲求生。范松涛有个已故堂弟叫范松涛，在作品中，松涛寻求的是灵魂的救赎，曾经走向苍茫的远方，而松涛已逝；松涛陷入的是现实的忧思，直接关联到现实中的两大难题，教育与住房。高中数学教师尽职尽责，还在课外帮助一些学生补数学课，为了偿还房贷而奔波。相对于学姐程凌云的“志在凌云”，邵瑾可阐释的内涵较为有限，她没有像程凌云那样凌虚高蹈，嫁给范松涛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给范松涛的遗孀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在《观相山》中，邵瑾半是调侃半是自叹道：“我看也就我们需要好好认识自己，不够格思考一切的……”“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的名言，思考一切则源自马克思。把两者整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合格的文化人。两者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为什么邵瑾会回退到自我认识的立场呢？

范松涛在作品中身影活跃的年度，正是行将50岁之际，时日尚早，邵瑾就在精心盘算如何给范松涛贺寿。50岁确实是个坎。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范松涛即将进入知天命之年，但作家从邵瑾的角度谈论给范松涛庆贺生日，生日成为邵瑾回望她与范松涛成家以来走过的诸多沟沟坎坎、往事烟云的契机，也成为总结各自人生经验的时间节点。邵瑾和范松涛因彼此的需要而走到一起，组合为一个新的家庭，在寻常岁月中忙于大大小小的家庭事务，情感日渐融洽，爱意愈演愈浓，成为一对模范夫妻，把自己活成了不打折扣的“好男人”“好女人”。“每天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养家糊口，一个为生活疲于奔命的人，还能葆有一点理想主义的品质，和对他人的温柔之情，这个人，不是君子，还有谁呢？”他们谨小慎微地维护着彼此的情感和物质需要，规规矩矩在切实可行的人生之路上行走，在作品中，连一次争吵翻脸的杯水波澜都不曾出现。

但是，当下的小日子的安稳静好，逃不脱一只看不见的大手的拨弄。程凌云和她的家人以及在贫困中生长的父子两代人、范松涛及其父母、范松涛前妻老曹为了读书的学费跪在父亲面前苦求而不得，还有大观为看望范松涛意外地遭遇车祸身亡的悲剧……过往的一切，造成邵瑾和范松涛的心灵创伤，怎样能够在漫长的时光中舔舐伤口、平复剧痛呢？虽然沉重往事成因复杂，并非邵瑾和范松涛之责，但是，亲人离去的痛苦，往事如烟的逃离，却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这也是他们接近天命的一大障碍。

眼下风平浪静的小日子，旧时难以抚平的大创痛，形成两个反差强烈的版块。怎样处理二者的关系，需要高超的技巧，以及更深层的生活哲学作为后盾。唐末诗人郑谷有一首感叹中年况味的诗作《中年》：“漠漠秦云淡淡天，新年景象入中年。情多最恨花无语，愁破方知酒有权。春色满寻故第，雨声一夜忆春田。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人到中年，万物褪色，怀念旧梦。“漠漠秦云淡淡天”，是因为风雨见多，对于色彩的敏感变得钝感。“寻故第”“忆春田”，是由于对已经有一定长度及内容的生命历程做及时的回溯。《观相山》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可以成为我们解读作品的引语：“从没有不合理的生活，只有不被理解的人生。”理解了人生，也就理解了曾经被视作天书一样难读的理论。邵瑾和程凌云有这样一段对话：“邵瑾‘嗯’了一声，又问你有没有觉得，以前那些令人头疼的书，哈耶克也好，凯恩斯也好，如今读着都好变得好懂了？程凌云说，那当然，有生活做注解嘛，要不是这些年岂不是白活。”

柴米油盐，喝青啤，洗海澡，为仍然处于青春期的儿女牵挂在心，和幸运的或者不幸的朋友交往，都是生活的常态。那些个人记忆中的惨烈伤怀才是意外，是偶然，是可以逐渐理解、逐渐释怀的。与之相应地，在情节和细节的书写中，那些有可能陡起波澜并具有强烈破坏性的桥段，都被切成碎片，在日常生活之水中浸润缓释，失去了应有的整体冲击力。理解了生活，就原谅了人生。始终缺席的范松涛的自杀之谜，是邵瑾心中的一大痛点，更是一大疑点。难以割舍的恋人断情辞世，令人刻骨铭心，其中是否有邵瑾自己的一份责任，更是难以排解。范松涛的死因一口气说起来，足以惊心动魄，分别在作品中的几处，就将其爆炸性切割成最小的板块，然后又被裹挟在当下生活的流涌中，稍纵即逝。更为重要的是，邵瑾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对自我的谴责可以做尽可能地排除，而归因于现实世界曾经的冷酷与贫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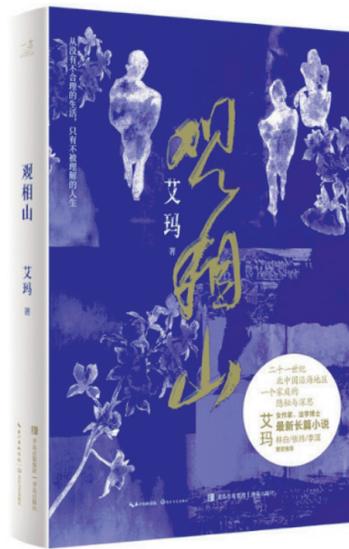
与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岁月的“50后”“60后”作家，以及出生和成长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时代的“80后”“90后”作家相比，“70后”作家曾经被描述为“尴尬”的一代，他们的代际标识含混不清，难以做出明晰的自我刻画。我想，艾玛的《观相山》可以视为是一种对于“70后”人生状态的精神塑像。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教授）

「七零」后人生状态的一次精神画像

——评艾玛长篇小说《观相山》

□张志忠



《观相山》，艾玛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